

政海秘聞 (五)

——從唐繼堯到龍雲

●后希鑑（淡江大學教授、中國醫藥學院教授）

實錄啓示愚衆可欺

梁啓超將雲南起義的「金」，完全貼在自己的臉上，固然好笑。看看雲南起義「在事人員」，以國民黨籍者爲衆，便說這是國民黨「全力以赴」，也非事實。讀讀呂志伊（天民）的「雲南舉義實錄」，貶唐貶蔡都是遺老遺少的妄行，不足爲訓。

到了今天，還在有人借雲南起義的「一面之詞」，加以「斷章取義」，要在現實政治中發生作用——這種走梁任公老路的打算，能够有什麼新作爲呢？因爲史實祇能「靠史實」取勝，不是靠「論」可以「黑白講」的。好在雲南起義，不過是民國時代的一件大事而已，去古未遠，資料一天豐富，已經不是「名家」或「權威」可以壟斷歷史的時代了。例如「抗戰」是誰的功一樣，史實就是史實，不容辯來論去；還在企圖將黑的說成白的，祇能怪自己不進步，冬烘的頭腦，已經不足以取寵於民智已開的大衆了。

在我個人看來，雲南起義之後，爲什麼會「聚訟紛紜」？原因祇有一個：起於「愚衆可欺」

。爲什麼辛亥革命，祇有「誰開第一槍」之類的爭議？原因也祇有一個，就是保皇黨不好爭功，其他黨派還未誕生，談不上爭功。所以，便平安無事。到了袁大總統時代，至少有三股政治勢力在「纏鬥」，或明或暗，昧於黨派「自吹」的國人，頭暈目眩，不悉什麼是真？不明什麼是假？識者渾水摸魚，趁衆人皆「醉」之時取利；無知無識的大衆，反正「國家事，管他娘」，任人偷雞摸狗，是非黑白，也就真象不問。三股勢力如次：

一是袁大頭所說：「百分責任，自擔八十分」。這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，滿腦子想的是做皇帝。既看不起搞政治的人，也不把「民意」放在眼裏。那些「蠅營狗苟」之輩，便成爲袁皇帝暗盤上的要員；籌安會諸公當然是「袁皇帝」精挑細選而來。那麼，執政的袁大頭，便利用公權力來鎮壓異端，公權力成了私權力，也就成了三股政治勢力之一——因刀槍在握，成爲唯我獨尊的勢力。

一是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反對黨——國民黨人。分裂之餘，仍不甘心袁賊稱帝。雖如喪家之犬

，仍懷推翻帝制壯志，到處尋找機會，趁機革命。

一是執政黨——進步黨頓失政權，已經義憤滿膺，加上籌安會的刺激，便大義凜然，跟老袁翻臉了。

在矛盾統一的「定律」之下，各路英雄向「雲南集中」，並不是什麼「神秘難解」之謎。——大家都有「拯救祖國，倒袁第一」的共識，才會千里迢迢，跑到雲南去發難。

但是千萬不要「受惑」——假如唐繼堯不是「真心倒袁」，並與當權派——袁世凱及其特務，進步黨的雲南巡按使任可澄等「虛與委蛇」，那些革命志士會有那麼傻？跑到雲南去自投羅網嗎？各方神聖是不是對唐繼堯有「信心」？念唐忠於共和？才會跑去雲南倒袁？這樣淺顯易懂的道理，竟使國人如處五里霧中，達半個世紀之久，寧非怪事。

唐繼堯蒙冤五十年，不管他地下有知無知，我認爲都是近代中國知識界的「怪現象」；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恥辱；因爲「以訛傳訛」這句成語，竟應驗在讀書不求其解的「治近代

史」諸先生之身上。

為什麼叫做「讀書不求甚解」呢？

一、蔡鍔領導的護國軍，為什麼要冠以一個地方性的形容詞？稱之曰「滇軍」？難道這種「中性」的形容詞，否定了他們的「革命性」？也不知察覺嗎？雲南護國軍的革命性，列舉如次：

(1) 滿清在滇的「新軍」推翻專制政體，造成了擁護共和的「時代趨勢」；後來雲南「各界」一致反對袁世凱稱帝，並非任何個人的「英雄事業」，難道還不明白嗎？為什麼要刻意凸出「個人」？

(2) 雲南護國軍是以反對「異族」（滿清）統治的姿態出現；所以，他們稱推翻朝廷成功為「光復雲南」。在漢、滿、蒙、回，藏諸族共和的觀點下，「光復」字樣是不是用的恰當？固然值得推敲；但是，革命黨人在「長期的驅逐隸虜的薰陶下」，說聲「光復雲南」，怎能據此排除革命陣營呢？何況是以「族」為分際，沒有畛域的意義。

(3) 在雲南響應武昌起義的革命軍，也像其他革命軍一樣，在「新軍」時代是由北洋軍系統所控制。但是，大多數被北洋軍官控制的新軍，雖然搖身一變而成共和革命軍，組織系統却未遭破壞；所以，袁世凱依然有「做皇帝夢」的本錢。祇有雲南的共和革命軍才逐殺將領，徹底奪得新軍的指揮權——也就是將校尉各級軍官，絕大多數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。因此，這批新軍的特性是「革命」、不是「地區」——雲南；祇能突出他們的「畛域性」，放棄他們的「革命性」，

誰說不是革命史上的敗筆呢？「倒袁」之日起應稱「護國軍」。

(4) 雲南護國軍雖然以雲南人為多數；但是，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孫中山之徒，他們的目標是共和革命——為何領導人是「全國性」的，被領導者也為「國事」而傷亡，為什麼不承認是全國性的隊伍呢？刻意凸出他們的「地方性」呢？

換言之，民初將「在滇軍人」奪權成功的革命軍「地方化」，便造成國民黨人空談理論，但知問鼎中原，缺乏腳踏實地，切實建立革命基地的成算——受袁世凱的「修理」，可以說「咎由自取」。

二、打擊唐繼堯並不等於「削藩」；因為唐繼堯與黨中央的矛盾，既非政治思潮（民主或專制）問題，也不是領導權誰屬（唐繼堯無打倒孫先生的野心）的問題；祇是達成民主制度的「策略問題」而已。

唐繼堯認為護國之役，雖然勝利了；但是，中國並未得到民主。護法之役，同樣採取「敵對」，中國依然沒有得到民主。倒不如採用美國的聯邦制度，劃分中央及地方的職權，用和平的方式，建立中國的民主政治；所以，唐繼堯很贊同聯省自治（地方自治）的構想。在行動上，唐繼堯一邊在雲南推行民主政治，一邊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各省實力人物掛鉤。

然而，袁世凱死後的北洋軍閥則是主張「武力統一中國」。也就是誰的「手臂粗」，誰就做老大；現在的中國不是這樣嗎？唐繼堯主張聯省自治，是從實踐（護國護法）中求得的結論，也

就是主張和平統一中國。

以唐繼堯的觀點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祇是一個「軍隊國家化」的問題。可是，在國民黨受愚於袁世凱之後，才想到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非自建武裝，掃除一切建國的障礙不可；因而不分清紅皂白，也不懂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之分野，更不知「不是敵人，便是朋友」的哲學，一律仇視，一律稱之曰軍閥，將昔日的信徒，也以軍閥視之。

這種過分中央集權的思想，必然造成自我意識的高張，個人崇拜便甚行於全中國了。不了解和平統一中國的意義，怎麼可以了解聯省自治的好處？今天，海峽兩岸的地方勢力，日越增強，美國式的聯邦思想，雖然沒有鼓吹，甚至避免談論，却在不知不覺中茁壯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所以，簡單的把唐繼堯歸類如北洋軍閥一般，不會是唐繼堯的錯；因為到了唐繼堯蓋棺定論之時，他反對的「新生事物」祇是中央集權，不是民主制度。除非老唐也贊成壓迫民主，不然，隨便罵唐繼堯是「什麼」，也是不符實際的；誰說不是罵大街呢？

有一本叫做「國民革命史」的書，可能是「揣測」有錯誤。作者雖未標明「貶唐揚蔡」的傳統觀點，字裡行間，仍以唐繼堯其人處於「被動」見責。為什麼不將唐繼堯派員與各省「接洽倒袁」之史實正面報導，反說唐繼堯「因候蔡鍔意向」，才成為灰色人物。可見國民黨並未「捨」雲南起義的「鏡頭」，不過是讀書不求甚解之徒，不是以訛傳訛的妄人，便是安心效勞現實政治

的勢利的小丑。雖至今日，「貶唐揚蔡」還在餘波盪漾；由不得要問一聲：「蔡鐸身在北京，實等幽禁；見說客就要錢、要槍、要人；深感倒袁不易的唐繼堯，為什麼非候蔡鐸的『意向』不可？」如果唐某要穿「黃馬褂」，昆明有的是欽差大臣；唐某要打倒袁世凱，蔡鐸在天羅地網之中；唐繼堯真的沒頭沒腦嗎？

蔡不揚，進步黨實「……空名而已，別無何等勢力之可言。吾人撫今追往，轉不得不嘆賞袁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，果有先見之明，賢於吾輩萬萬也……」這才是為何貶唐的真實理由。（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中華新報「進步黨員之憤慨」。）

呂志伊的「雲南舉義實錄」，（北京「民國新報」，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至十一日）便可看出在籌安會之前，國民黨人是怎樣不顧生死，要「創造時勢」，以拯救民國。同時也可看出唐繼堯在袁世凱的強大壓力下，如何「以假亂真」，達到陽奉陰違，以收「保存革命實力」之效。更可以看出蔡鐸應袁大總統之命，赴京「養晦」之後，被唐繼堯「編餘」的軍官們，是如何熱心共和，跟呂志伊「暗中結合倒袁」的情形。如果說唐繼堯受迫而倒袁，不是受迫於蔡鐸，是受迫於當時的留日同學諸公及部隊幹部造成倒袁的「氣勢」。呂志伊到南洋去募款，便是「袁世凱乃龐然大物，非一省之力可以推翻，求助於革命之母」的鐵證。可惜國民黨的後死者不察，在編護國史的時候，還在相信幼年所讀的教科書、誤導史實。

護國公案到了今天，還在冷鍋裡炸豆，不過是不平則鳴的道理。如果史實就是史實，在事出力人員都有份；如果國民黨人及進步黨人承認是在「沒有口號」的合作下推翻袁世凱，這場擾攘不休的「史論」，還有什麼好論呢？

教科書史事須改正

在我們街上，有一名姓席的老者，因為懂得「地理」（風水），又識文字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我讀小學，見席家二樓的窗門上，寫着斗大的「唐」字。這時，傳說「唐公」已經吞金自殺過世，唐的勢力不復存在，但席家窗上的「唐」字並未抹去。聽說書寫這個「唐」字的席老先生，在雲南內戰中是支持「唐派」；但是，我們的小學老師對蔡鐸的「出京」，歌頌得如痴如狂。可見蔡唐二公，在雲南民間，都有「人緣」。

我在昆明新聞界服務的時候，已經是龍雲主政多年了，情形大有不同——蔡唐二公已經變成「唐蔡二公」去了。如果談到「軍中倫理」，蔡先唐後，理所當然。如果以護國論先後，唐既坐鎮後方，發號施令，自然應該唐先蔡後。可惜蔡唐二人均已作古，不知他們舉義之時，有沒有想到歌功頌德的後人，會在這個「排名」問題上作文章。

並非所有的雲南人都是「唐」派；但是，有的雲南人祇願在私下（或不願透露姓名）罵唐繼堯。在正式場合，尤其在紀念「雲南起義」或「護國紀念」之日，都把護國起義之功，歸之於唐繼堯。蔡公不是敬陪末座，而是梁啟超「貪天之

功」，歪曲事實，將雲南人流血流汗的成果，都歸於他們師生兩人；所以，因為憤恨梁啟超祇提到蔡鐸在雲南起義中的作用，未提到雲南人對共和竭盡盡力的辛勞，便對蔡公「淡化」了。

甚至於有人說：梁啟超曾要唐繼堯出資七十萬銀元，讓進步黨有錢活動。梁派私下也說：四川前線戰況（護國）正緊，唐繼堯不肯供應蔡公薪餉彈藥。這種強調蔡唐之間有矛盾的說法，顯然各有漏洞——實際情形如何？大家都不願提——而是「是非一大堆」。

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蔡鐸存電唐繼堯：「急。雲南唐都督鑒：昆密。我軍激戰旬，耗彈頗多。炮彈現只存二百發，槍彈除原領者悉數用罄外，縱列彈藥亦耗三分之一。各部隊紛紛告急，請予補充。逆料在川境內，尚有數場惡戰，務乞飭兵站速配解炮彈三千顆，槍彈每支加發三百發，趕運來瀘，不勝禱切。查滇存炮彈為數甚少，並懇向日本定購兩三萬發，借資接濟。如何？乞示復。鐸叩。」

從這則電文裡，我們可以看出四件事：一、護國軍有必勝之心；二、前方急需彈藥，三、滇境存彈不多，四、主張舉外債革命。如果以蔡鐸過日的秘密借款所需時日而言（用於廣西護國軍），恐怕彈藥還沒有運到前線，袁世凱老早就死了。可見當時的雲南，羅掘已盡，才會想到「舉債」之法。然而，艱苦的歲月總算熬過去了；誰知「後人」竟將這種「窮得無奈」的史實，「反面處理」，作為攻訐唐繼堯的口實。

既然抓破了臉，便找弱點互相攻擊。蔡公不

見得是「完人」——雲南人會這樣說：雲南是爲約法（護憲）而戰，所以主張大總統死了（袁世凱），應該由副總統黎元洪（曾參加武昌起義）繼任，爲什麼蔡鐸要簽名推薦段祺瑞？顯然違背約法（憲法）。蔡鐸倒袁的目的，不是「護憲」，而是爲了權勢。於是，蔡公說：簽名是別人代簽的。

換言之，唐繼堯堅持約法的立場，必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；其他主張都是違背約法的。幸好蔡鐸早日蓋棺，得了「擁護共和」之名。但是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據口耳相傳，蔡鐸出川的部下回滇，驅逐唐繼堯遠走香港，是袁世凱餘黨段祺瑞「運動」所造成。

這裡指的百足之蟲就是袁世凱——他雖然死了，但他的勢力並未作彌猴散；軍閥時代便正式在中國上演了。

不管時代如何變遷，對雲南人來說，大家還是忠於史實，不認爲自己的祖先是後知後覺，也不認爲自己的祖先沒有胆識，心中總是有不平之氣。每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紀念日，大家都會想到蔡公及唐公。不論在臺灣，在緬北，在泰北的雲南人，他們都會相信蔡公牽着唐公的鼻子走嗎？

所以，雲南籍的中央民代，不祇一次，也不祇一人，不斷向執政黨及政府有關部門陳情，闡述雲南起義並非蔡鐸師生二人導演的傀儡戲——政府編印教科的先生不察實情，採信梁啓超（政黨宣傳）一面之詞，作爲史料，抹殺了雲南志士的主動性，造成全國的錯覺；尤其版本不同的教

科書，互相抄襲，以訛傳訛，殊非所宜，要求回歸正常，以史實爲準。因此，現行的教科書根據史實編成，是雲南中央民意代表多年多次努力的結果，並非國民黨有意往自己的臉上貼金。

在我們雲南人看來，倒是國民黨麻木不仁：那麼多「黨籍志士」參加雲南起義，死的是國民黨分子，流血的是國民黨分子。可是，「以黨治國」的政府單位，還是「懶於查證史實」，聽信進步黨人的「獨佔宣傳」，才會造成雲南人在流血流汗之餘，落得一個「傀儡之勇」的餘憾；時至今日，還要被遺老遺少「麗大街」，說成「風派」。

我在這裡祇說一句話：「爲了某些政治勢力罵大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史實才是最正確的答。」以雲南起義來說，史料一天的增加，擔任最後裁判的不是「斷章取義」，不是自說自話的「論說宏文」，而是史料。大陸爲了護國（雲南起義）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二次重要的革命戰爭，我看到所出的兩本書：一是「護國運動資料選編」，一是「護國討袁親歷記」。希望對雲南起義有興趣的朋友，設法找來看看——因爲這場近代史上的戰爭「進行」之時，共產黨還未成立，不會偏向某方。可惜的是唐繼堯爲了「反對中央集權，主張聯省自治」；兩黨對他都很不愉快，雲南人遭到城門失火之殃，祇能怪地域觀念加上邏輯頭腦的不靈光了。

林虎之言——可以攻錯

寫李宗仁口述傳記的唐德剛教授說，李宗仁

老愛談「護國」……，意思好像在說：護國時代的李宗仁、不過是一名乏庸官，高談護國大政幹嗎？

我想問問讀者諸君：李宗仁高談護國，真的錯到那裡去？真是好管閒事嗎？我想，李宗仁錯不到那裡去。

護國倒袁革命，不是「一夜之間」發動起來的事，更不是三言兩語便能促成。蔡鐸十二月十九日到達昆明，二十三日唐繼堯及任可澄（袁政府之雲南開武將軍及雲南巡按使）等電袁世凱取消帝制……，時間不過四、五天，請問任何話劇社：就算有了劇本，在這短促的時日內，能演出「一齣話劇嗎？何況真刀真槍的倒袁？」

護國之役，除了「雲貴」之外，還有許許多多參與其事的實例——廣西各級軍人，也是在「醞釀」中完成「護國倒袁」運動；怎能強迫李宗仁忘懷呢？

參與護國運動的人，不論軍職文職，不論職級大小，都投入一份「心力」。所以，老兵談護國，談倒袁，已是南中國人士的興致；因爲這是他們生命史上的一段樂章。

林虎在「我與陸榮廷聯袂討袁護國的經過」一文中說：「迨雲南提出起義先決條件（唐繼堯「要人」——須得廣西保證支持）後，即由鈕永建和我由香港進南寧要求陸榮廷同意。」林虎等完成任務回港，「……突接楊永泰從上海打來密電，據知蔡鐸已脫險離開北京，乘某輪來港，要我們接待他。我們當某輪到港時，就派人把蔡鐸接上來。這時蔡還不知道我們在雲南進行的情況

，他只說他對袁世凱做皇帝非常憤慨，因而冒險離開北京，打算入雲南發動討袁，能够發動一連算一連，不顧成敗利鈍。經我們把在雲南進行的情況告訴他，他大喜過望，說是非出京時意料所及。其時，雲南的情況漸趨明朗化，羅佩金，顧品珍等的活動成爲公開的秘密……」

不知梁任公再生，看了這篇文章作何感想？

國民黨既然分裂了，各人的遭遇不同，感受也不一樣。我們祇好用唐繼堯說的話來作結論——「若果一定要說誰發動雲南起義，這個人就是「孫先生」。」

保密防諜進行倒袁

筆者在上面說過，明明是一件落敗的國民黨人及失寵的進步黨人，在沒有合作的口號下，合作幹出的一樁再造共和大業，却被現實政治攪局，說成「蔡主唐從」的歷史公案。造成唐繼堯的尷尬，雲南人的臉面無光。

雲南人對「蔡主唐從」的歪曲史實，當然要抗辯。

老一輩的雲南人對「蔡主唐從」的說法，提出反駁，大抵是這樣說的：

一、唐繼堯由黔督調任滇督之時，就查覺老袁心懷鬼胎了。老袁蹂躪國會、驅散議員，正是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；所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獨唐繼堯不懂嗎？唐公當然深知老袁的「異謀」。所以，唐公便整軍經武，購械練兵，無非是要對老袁發難。因爲唐公是共和革命分子。

二、唐繼堯任黔督時，曾通電全國，反對老

袁舉貸外債。足見膽識獨具。

三、唐繼堯分派人員去各省刺探消息，相機聯絡共同倒袁；包括蘇、浙、川、粵、桂、湘及南洋等處。

四、唐繼堯召集軍中將校，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，開會討袁。又於十月七日召集第二次討袁會議，並有具體決議：①若有中部一省響應倒袁之時，雲南即舉義旗。②黔、桂、川三省之中，若有一省響應倒袁，雲南一定首義。③海外華僑或國民黨（呂志伊赴南洋募款）接濟餉糈，雲南也願意起義倒袁。④以上三項希望均不能實現，雲南共和革命軍爲了爭「國民人格」，也要孤注一擲，宣告反袁。

當時的雲南，僅有共和革命軍二師。北洋軍多到數十萬計。所以，唐繼堯及滇中革命軍將校，要反對帝制，猶如「螳臂當車」。以少勝衆，恐怕不是沒有周全準備的鬥士所能辦到。所以，滇中共和革命軍的一切反帝制活動，都在暗中進行；通都大邑的「國士」，怎會全盤了解？

但是，各方志士，都相信唐繼堯率領的反革命軍，忠於共和，都紛紛向雲南省會集中。相反的，老袁的間諜及第五縱隊，也加緊在雲南的活動，何國華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在這五方雜處，政治利益衝突的情形下，雲南反專制的革命隊伍，採取什麼措施呢？還是一句老話：一面對老袁及其派至雲南的「特種」人物，虛與委蛇；一面安頓來滇游說倒袁的志士。唐繼堯的處境如何？不難想像。

袁世凱派來雲南活動的特工人員，當時稱爲

「袁氏私黨」，當然會偵知唐繼堯的真實態度，一面密電老袁嚴防，一面煽惑滇中共和革命軍，破壞反袁稱帝陣線。唐繼堯於民國四年十一月三日又召集第三次反袁中上幹部會議，主題有二：①宣佈反對袁大頭帝制運動之佈置，正在大力進行。②倒袁一事，關係重大，如何嚴防奸細（袁氏特工人員），煽惑軍心，各級將校都要更盡心盡力去做。這一次會議可以說是唐繼堯表明心迹的關鍵，也是後來護國諸先進「敵血爲盟」的濫觴。可以想見當日討袁，並非易如反掌之事。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，當時已知「保密防諜」的重要。

反過來說，老袁並非平庸之輩，深知用間諜之道，唐繼堯才會那樣提高警覺。所以，派唐三去迎接李、蔡二公，打的是去法越考察自來水的旗號。派鄧泰中及楊蔡兩個支隊出川反袁，也是說派他們去剿土匪。

以上這些「佈置」，都是李烈鈞及蔡鍔還沒有到達雲南以前的事。可見唐繼堯也是大有「膽識」倒袁的革命軍人。我們非常希望對唐繼堯罵大街的朋友們，提出「史料」，否定這些「史實」——光憑自說自話的「宏論」，是不足以取信於人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